

桑弘羊傳

馬元材（非百）著



马元材（非百）著

桑弘羊傳

中州书画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全面叙述了桑弘羊的生平，着重论述了他的理财思想和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汉武帝“富国强兵”的种种改革措施。

桑 弘 羊 传

马元材(非百)

责任编辑 庄 昭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 南 许 昌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河 南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850×1168毫米32开 5 印张 118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1219·4 定价0.59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言	1
第一节 桑弘羊在历史上的地位	1
第二节 桑弘羊所处时代的特征	3
第三节 桑弘羊的政治态度	5
第二章 幼年时代 ——汉景帝刘启五年（前一五二）——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〇）	7
第一节 “富冠海内商遍天下”的诞生地——洛阳	7
第二节 故乡先进及桑弘羊的家世	8
第三节 生年问题	13
第四节 匈奴的三次入侵	16
第三章 侍中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元鼎二年（前一—五）	18
第一节 侍中制度及其得为侍中的原因之推测	18
第二节 汉武帝即位后爆发之第一次政治斗争	19
第三节 抗击匈奴战争的爆发	20
第四节 桑弘羊是抗匈战争的热烈拥护者	22
第五节 战前之财政准备与民生情况	24
第六节 战争前期军政各费渐感困绌	27
第七节 参预财政的开端	30
第八节 白鹿皮币政策及告缗令	35
第九节 战争进展情形与和亲论的复起	43
第四章 大农中丞时代 ——元鼎二年（前一—五）——元封元年（前一〇）	46

第一节	对匈奴战争的暂时停顿与西羌两粤兵事的进行	46
第二节	“兵据西域”之策——屯田政策	49
第三节	张骞西征及其使命	51
第四节	币制统一的完成	56
第五节	均输法的试办与入粟补官政策及告缗令的继续推行	63
第六节	主管各地公田农官的设立	66
第五章 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时代 ——元封元年（前一一〇）		
	——天汉元年（前—〇〇）	69
第一节	最得意的十一年	69
第二节	盐铁官营政策的展开	70
第三节	均输法的扩大范围及平准法之设立	80
第四节	第一年成绩概观	85
第五节	马队大示威和汉宛善马之战	87
第六节	水利事业的继续开发	91
第六章 大司农时代 ——天汉元年（前—〇〇）——天汉四年（前九七）		
	（前九七）	94
第一节	大司农之真除	94
第二节	各地农民暴动的蜂起和桑弘羊对农民暴动的态度	95
第三节	酒榷法的创行	99
第四节	昆弟子之犯法与桑弘羊之贬官	101
第七章 搜粟都尉时代 ——天汉四年（前九七）——后元二年（前八七）		
	（前八七）	106
第一节	大司农之虚悬	106
第二节	对匈奴战争的失利	106
第三节	赎死罪法的举行	108
第四节	黄金形制之改铸	110

第五节	捷枝渠犁屯田计划	114
第六节	官营渔业及其它	116
第七节	农业生产新方法的推广	118
第八章	御史大夫时代 —— 后元二年（前八七）—— 昭帝元凤元年（前八〇）	123
第一节	同膺顾命	123
第二节	盐铁会议	125
第三节	重刑罚的思想与“博物通士”	133
第四节	从盐铁会议双方发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社会 上升阶段地主阶级经济生活的繁荣情形	139
第五节	参加燕王旦的夺权活动及其失败	147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桑弘羊在历史上的地位

桑弘羊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的理财家。他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先后协助汉武帝处理政务几十年，从财政经济等具体措施上和理论上支持并捍卫了汉武帝的政治主张，对当日的实际政治和后世的思想影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长期以来，在评价桑弘羊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当时贤良文学之士对桑弘羊进行了贬斥。和他同时的太史令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里，既不为桑弘羊立传，却一方面在《平准书》中借用反对派卜式的话——“烹弘羊，天乃雨”——来对桑弘羊加以咒骂，另一方面又在《货殖列传》中，为桑弘羊执行汉武帝财政政策时所打击的对象——“富商大贾”歌功颂德，而且还公开提出“故善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的所谓理论来为反对桑弘羊执行的各种官营政策制造舆论。汉宣帝时，桓宽编次的《盐铁论》，虽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盐铁会议上不同观点争论的史料，使后人研究桑弘羊的思想和行事有所依据；但桓宽本人也是有倾向性的，他把桑弘羊安放在被告的地位，有意识地贬低了桑弘羊。特别是宋代的一些人，为了攻击王安石，也指桑骂槐地把矛头指向了桑弘羊。他们指责桑弘羊是为汉武帝搜刮钱财的“聚敛之臣”（《文献通考·征榷二》）。司马光诋毁桑弘羊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权，其害有甚于加赋”（《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苏辙也说桑弘羊“法术不正”，“民受其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从上述对桑弘羊

的贬抑声中,显示出代表豪强大地主利益的这些人的反动立场。后代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和进步的思想家,则肯定了桑弘羊。例如《齐民要术》的著者后魏贾思勰,就赞扬桑弘羊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齐民要术·序言》)。唐朝的大理财家刘晏,曾把自己的理财策比之为桑弘羊的“重兴功利”(《旧唐书·刘晏列传》)。北宋的王安石则说:“周置泉府之官,以权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明代思想家李贽把桑弘羊列入“富国名臣”中,认为他所实行的“均输之法,是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桑弘羊者不可少也”(《藏书·富国名臣总论》)。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孙中山对于桑弘羊更是十分佩服。他在所著《孙文学说》中,一则曰“古今惟桑弘羊为知金钱之为用”,“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今日之中国,犹受金钱之困。”再则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所行之新经济政策,皆桑弘羊之遗意。”一篇之中,盖不仅三致意焉而已^①!对桑弘羊的不同评价,反映出历史上不同政治倾向和主张之间的尖锐分歧。但他们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都不可能真正认识桑弘羊的历史作用。究竟桑弘羊是什么人?他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① 《孙文学说》第二章。原文云:“昔者汉兴,承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初以为钱少而困也,乃令民铸钱。后钱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铸钱。皆不得其当也。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方当欧战大作,举国从军,生产停滞,金钱低落,而交战国各国之政府,乃悉收全国工商事业而经营之,以益军资而均民用。德奥行之于先,各国效之于后,此亦弘羊之遗意也。”又同书下文,有“俾士麦行社会主义于德意志,乃近代之桑弘羊”的话,虽比拟不伦,但亦可见孙中山对桑弘羊评价之高!

第二节 桑弘羊所处时代的特征

一个历史人物的产生及其思想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分不开的。桑弘羊当然也不能例外。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几乎全部与汉武帝当政的年代相始终；而在汉武帝当政的整个年代中，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怎样呢？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问题。自从汉高帝刘邦继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基本上采用了秦朝的制度，促进了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奴隶制残余势力还是存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有分裂割据势力。二者又往往互相勾结，不断发动反对中央的武装叛乱。从汉高帝刘邦到景帝刘启，对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粉碎了一次又一次叛乱，来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但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这个集团和富商大贾集团在经济上互相勾结利用，政治上串通一气，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进行分裂割据的活动，反对中央集权，反对任何改革和进步措施。例如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时，长安子钱家拒绝贷款资助军费。（《史记·货殖列传》）汉武帝派遣使者开仓赈济山东被灾贫民，而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同时，为了抗击匈奴，汉武帝下诏号召诸侯出人力车马，但是“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莫求从军。”（同上）这说明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强大，对中央集权依旧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进一步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在斗争中完善和发展中央集权制度，以便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的统一，这是汉朝政府面临的历史任务。

第二，是抗战与和亲的问题。这时我国地主阶级的中央政权

和我国北方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匈奴统治者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东部和西部几十个小邦，俨然是北方一霸。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农业国，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这个先进农业国看成为一块肥肉。他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方进行武装掠夺，破坏中原农业生产，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而汉朝的一些诸侯王国，又常常与匈奴勾结，里应外合，发动叛乱。如汉初韩王信，代王陈豨，燕王卢绾，都先后与匈奴交通（《史记·韩王信、卢绾、陈豨列传》）。景帝时，七国之乱，又有吴王、楚王、赵王和匈奴阴谋勾结（《史记·吴王濞列传》）。武帝抗击匈奴，地方豪强势力也“颇有异心”（《盐铁论·西域篇》）。因此，以自卫战争，粉碎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的进攻，以保卫和巩固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汉朝政府面临的又一个历史任务。

第三，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在汉文帝刘恒时，政治家贾谊主张改革，而“绌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认为“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因而刘恒“不用其议”（《史记·贾生列传》）。又政治家晁错“数上书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而“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以致“书数十上，孝文不听”。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尝数请问言事，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善之。后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诸侯皆喧哗。及吴楚七国反，以诛错为名，终被给斩东市（《史记·晁错列传》）。武帝时，这样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更加剧烈。有的主张盐铁等企业官营，及进行抗击匈奴的战争，而另外一些人如董仲舒、博士徐偃、狄山等则纷纷起来反对。董仲舒主张“盐铁皆归于民”，为分裂割据势力及富商大贾垄断经济命脉制造舆论（《汉书·食货志》）。徐偃则公开申通诸侯王，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破坏盐铁官营的正确方针（《汉书·终军传》）；狄山则和反战派代表人物韩安国一样，坚持和亲论，反对进行抗击匈奴的战争（《汉书·张汤传》）。在思想倾

向问题上,前者主张“因时而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实行变革,而后者如赵绾、王臧之流则屡请“立明堂以朝诸侯”(《史记·儒林传》),董仲舒甚至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汉书·董仲舒传》)。总而言之,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主张与倾向,这又是汉朝政府必须立即作出决定的一件大事情。

第三节 桑弘羊的政治态度

在这两种不同政治主张与倾向面前,汉武帝表面上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但实际上并没有把他的建议付诸实践,董仲舒也没有得到重用(《汉书·董仲舒传》)。与此相反,他倾向于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地主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出发,坚决地采取了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并以全力抗击匈奴,改变北方邻敌压境的局面。而桑弘羊则是完全站在汉武帝一边的。他从财政经济的具体措施上,帮助汉武帝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重要政策,特别是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盐铁等企业的官营政策,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政治措施。后来,在盐铁会议中,他又从理论上驳斥了贤良文学们的种种非难,捍卫了汉武帝的政治改革措施。这就是桑弘羊一生最主要的政治实践活动。

但是,桑弘羊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官尊者禄厚”,“父尊者子贵”(《盐铁论·刺权篇》)的浓厚的封建富贵利禄思想。为了争权夺利,在汉武帝死后,他就和主政的霍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甚至同一个反对汉武帝政治改革措施的阴谋集团发生了联系。在这一集团的阴谋败露后,桑弘羊也由于政治上的失足,遭到封建国家的法律制裁。

全面地历史地分析桑弘羊的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桑弘羊在汉武帝当政期间,和在昭帝即位后最初几年,他是支持和捍卫了汉武帝的政治改革措施的,但由于受到“尚权利”(《盐铁论·杂论篇》)的世界观的驱使,到晚年在政治上失了足,以致身败名裂。但我们不能

因为霍光杀害了他，而由此否定霍光。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肯定了霍光，便抹煞桑弘羊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量的历史资料，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章 幼年时代

——汉景帝刘启五年(前一五二)——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〇)

第一节 “富冠海内商遍天下”的诞生地——洛阳

桑弘羊是洛阳人。

洛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座古城。自从周公计划经营，作为东征的根据地之后，洛阳就成了周朝统治天下的军事和政治的重心。平王东迁，洛阳由陪都一跃而为正式的首都，其地位自亦因之盖形重要。秦灭两周，洛阳亦入于秦。始皇时，乃更加大其城，以为吕不韦的食邑（《水经穀水注》）。因地居天下之中，为东西南北各国往来的必经之道。加以自周公东征后，把前后所俘虏的殷人，除一小部分分别赐给鲁、卫等贵族随带赴任，作为奴隶使用外，其余大部分则滥以“顽民”的称号，而被安置在洛阳城中。周书里的“洛诰”一篇，就是周公对这些“顽民”的训词。这些“顽民”所处的地位，就好象后世在各地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已没有了国家，也不能过问政治。但他们还要生活，就只有在新王朝所能允许的条件之下，去从事于贸易；这样便特别促进了洛阳的商业之发展。在春秋时代，郑国的商人弦高，就早以洛阳为其市场活动的范围了^①。战国时代，则商业已成为洛阳人的主要职业。我们只看“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十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周人以商贾为资”（《史记·游侠列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郑”（《史记·货殖列传》），“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

^① 郑商人弦高贩牛于周，遇秦人袭郑之师，乃以牛十二条，假郑国国君之命犒之，秦师遂退还。见《左传三十三年传》。

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同上)。这一类的描绘，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数见而不一见，就可证明。又《汉书》作者班固也说：“周人之失，好伪趋利，贵财贱义，贵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书·地理志》)则洛阳为商业发达的地方，由周至汉，数百年间，是没有什么变更的。

在桑弘羊的时代，周地是“商遍天下”与“宛”及“齐”“鲁”并称于世的(桑弘羊语，见《盐铁论·力耕篇》)。据桑弘羊的统计，那时“天下名都”，共有十个。即燕地的涿(今河北省涿县)和蓟(今河北省蓟县)，赵地的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魏地的温(今河南省温县)和轵(今河南省济源县南)，韩地的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齐地的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楚地的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东南)，郑地的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和周地的三川(桑弘羊语，见《盐铁论·通有篇》)。三川就是洛阳。这些“天下名都”，都是“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同上)，“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桑弘羊语，见《盐铁论·力耕篇》)，所以其中，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桑弘羊语，见《盐铁论·通有篇》)，而以“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同上)之故，却皆能拥有“富冠海内”和“殷富大都”(桑弘羊语，见《盐铁论·力耕篇》)的徽号。

第二节 故乡先进及桑弘羊的家世

在洛阳这样的一个“富冠海内”“商遍天下”的地方，又有自周至汉几百年间的长期影响，对于著名的政治和经济的名家——桑弘羊的诞生，恐怕是不无关系的。

事实上，或为桑弘羊生平所最拳拳服膺，或则在思想及政策上有极密切的影响的苏秦、白圭、师史、贾谊，就都是洛阳人。

苏秦是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他曾到过秦国，说过秦惠王，秦惠王不用。后来，他又往说燕、赵二国，主张由赵国召集六国诸侯，举行洹水(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境)会议，组织六国同盟，合纵抗秦。而以赵王为纵约长。赵王欣然赞成，因资送他到各国去，分别

进行游说,各国也都同意了。结果,为犀首的连衡政策所败。事虽未成^①,而苏秦却因此身佩六国相印,荣归洛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母嫂妻子,无不畏惧,西周之君,也替他清道郊迎。这一幕“衣锦还乡”的喜剧,所给予洛阳的后代子弟们的刺激,无疑是很大的(《战国策·秦策》及《史记·苏秦列传》)。桑弘羊后来和贤良文学辩论时,对于这位故乡老前辈,称之为“天下名士”,美之为“知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桑弘羊语,见《盐铁论·褒贤篇》)。苏秦所谓“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言论(《战国策·秦策》及《史记·苏秦列传》),显然对于形成桑弘羊的“尚权利”的世界观有着一定的影响。

这个白圭和魏文侯时代的白圭不是一人^②,他与孟轲同时。他常以“治水愈于禹”自夸。他善于理财。他的理财宗旨,据他和孟轲的谈话,是要实行“二十而取一”的轻税政策(《孟子·告子》下篇)。

他对于商业,更有其特立独行的一贯见解。首先,他主张以“观时变”为经营商业的主要法门。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譬如在岁熟的时候,则取谷而予之丝、漆、茧,而在岁凶的时候,则取絮帛而予之食(《史记·货殖列传》)。这和后来桑弘羊的贱买贵卖政策,是有其“薪尽火传”的关系的。

他对于经济恐慌循环发生的原因,也和大商业家计然一样,主张以太阴的移转变化为解释。所以他对于经济荣枯盛衰的预测,

① 苏秦说六国,合纵拒秦,各国虽皆表示赞成,但洹水会议并未举行,即告失败。参看一九四四年重庆大道出版社拙著《秦史纲要》上册第三章第二节。

② 姚鼐《惜抱轩笔记》云:“《孟子章句》引《史记》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云云,‘或谓《货殖传》云: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圭为魏文时人,不得下与孟子相及。疑此别一白圭’。盖谓《货殖传》‘当魏文侯时’五字,当属李克说,言旧有此尽地力之教而已。而后白圭乃别用一术,非谓圭亦文侯时人也。故载圭言‘吾治生产,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时人,亦安取称述后进如吴起、商鞅者乎?故知集注之非误也。”今案《史记·邹阳传》:“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又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君欲杀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遂拔中山。事见《战国策》及《吕氏春秋》。可见魏文侯时确有一白圭,不过《货殖传》白圭称述后进吴起、商鞅,自是另一白圭。与魏文侯时白圭之为中山将者不是一人。姚说得之。

就以这个太阴移转变化说为其唯一之准绳。他说：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同上）。

这好象和近世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詹明司的太阳黑子说（Sun spot theory）^① 有点相似。而这个，后来也被桑弘羊完全承袭了^②。

他认为耕农与经商，所采取的办法，应该不同。如果要想经商赚钱，就应该以次等的谷物为其买进之对象；而如果要从事耕农，以增加粮食的生产，则非选择上等的谷物作为种子不可^③。

他是很注重个人修养的。所以他平日便能够“薄饮食，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尤其在“趋时”方面，好象和猛兽鸷鸟之搏击食物一样，决不肯轻易放过任何有利的机会（《史记·货殖列传》）。

他以为“治生”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在他的眼光看来，治生之重要，是不在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之下的。因此，如果有人要跟他去当学徒，必须受到十分严格的资格之限制。第一，要其“智足以与权变”，就是能随机应变，不可过于呆板；第二，要其“勇足以决断”，就是要有判断力和决心；第三，要“仁能取予”，就是要有能取能予的度量；第四，要“彊能有所守”，就是要有毅力，有耐性。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他是断乎不肯随便传授的（同上）。

洛阳的第三位先进，就是师史。

① 太阳黑子说（Sun spot theory）认为经济盛衰之循环，在十九世纪中，每隔十年便有发生恐慌之现象，与太阳每隔十年出现黑点之期相符。倡是说者为詹明司（William Stanley Jevons），他说，人类食料占生活费之半。太阳约每十年增加黑点，减少热度。故每隔十年，岁有丰歉，而经济界之恐慌，亦相伴而来。但事实上并不相符。此说早已无人信服的了！

② 桑弘羊说：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见《盐铁论·水旱篇》，其义与白圭所云殆全相同。

③ 此段原文为：“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见《史记·货殖列传》。两“长”字皆作增加讲。

师史是甚么时候的人，现在已知道了。他也没有关于商业的理论。但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却也有他的特长。第一是他的心思细密，第二是能用人。其次则他善于利用一般洛阳子弟学徒的虚荣心理，信任他们，使他们推着货车，远远地自由去经营贸易。结果，他居然发了七千万的大财(同上)。

最后，与桑弘羊为同乡而又在思想和政策上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怕要算贾谊了。

贾谊是一个著名的“明申商”(《汉书·司马迁传》)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汉文帝时，曾上过一篇洋洋万言的《陈政事疏》。那疏中的内容，分别见于《汉书·贾谊传》及《食货志》。计共分为：

1.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为痛哭者一)；
2. 非和亲主义；
3. 抑奢侈(以上可为流涕者二)；
4. 提倡礼义廉耻以正纪纲；
5. 严太子教育；
6. 礼治主义；
7. 尊重大臣(以上可为长太息者四)；
8. 积贮之重要；
9. 非放铸论——(以上可为长太息者二。合上述共为可为长太息者六)。

除第一项曾为文帝所采纳，分齐为六国，尽立齐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为王之外(《汉书·文纪》及《贾谊传》)，其余八项都未为文帝所用，直至汉武帝时，才分别付诸实行。其中非和亲主义，积贮之重要，及非放铸论等三项，则完全为桑弘羊所继承而加以发挥。他俩的关系，在桑弘羊的生平言论中，虽然找不到确切的提及贾谊的证据，但事实上，则桑弘羊所行，和贾谊所言，是完全如出一辙的。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再说。